

近代文化研究的继承与创新

龚书铎教授八秩初度纪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文化研究的继承与创新:龚书铎教授八秩初度
纪念/本书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7
ISBN 978-7-101-07339-3

I.近… II.本… III.文化史—中国—近代—文
集 IV.K25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8150 号

书 名	近代文化研究的继承与创新 ——龚书铎教授八秩初度纪念
编 者	本书编辑委员会
责任编辑	欧阳红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31¼ 插页 6 字数 50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7339-3
定 价	76.00 元

新时期三十年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张昭军 宋小庆

中国近代（1840—1949 年）文化史，既是中国文化通史的组成，又是中国近代史属下的专史。它内容宽广、宏富、驳杂，又富有变化。相当长的时间内，少有学者予以专门研究。1978 年以后，以中国近代文化为对象的研究成果由微而著，渐积渐多。今天，无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还是日本、美国等国，重要成果已不胜枚举。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中国近代文化史历经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和精心培育，初步成熟。本文拟就中国大陆地区近三十年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作一简要回顾，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教^①。

—

作为一门专史，文化史在中国的历史并不太长。20 世纪初期，伴随西方新史学的东来，文明史和文化史流入中国。二三十年代，从事文化史研究的学人已不罕见，梁启超、柳诒徵、陈登原等都是这一领域的著名专家。约在同期，文化史进入大中学校课堂，以文化史题名的著作、讲义陆续出版。30 年代中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收录各种专题文化史著作五十种。粗略统计，1949 年之前的三十年，中国人出版的文化史、文化学方面的学术专著和译著不会少于二百种。但在此后近三十年间，中国大陆地区的文化史教学与研究，

^① 为便于表述，本文所说的文化史，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实际出发，参考梁启超、蔡尚思等人的观点，包括思想史、学术史、观念史等在内。蔡尚思：《论中国文化的几个重大问题》，《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与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一起，被强行中止。大陆地区没有一所大学开设文化史专业课程，没有一个单位设有专门的文化史研究机构。尽管与文化史相关的学科，诸如文学史、哲学史、宗教史、艺术史等，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进展，并培养了一批学有所长的人才，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并不能取代文化史的地位。

1978年后，思想解放，中外文化交流增多，深刻认识中外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文化史研究再度兴起。1978年冬，复旦大学历史系成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次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设置文化史研究室。这两个机构的规模在当时很小，研究人员均不及十人，但却从组织上为专门研究文化史提供了方便。1979年，蔡尚思出版《中国文化史要论》一书，作为新时期第一本文化史著作，深得读者喜爱。中国文化史的重兴，直接带动了近代文化史研究。

新时期三十年，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在学科建设、理论方法、学术范式、研究重心等方面，前后相较，有着较为明显的变化和进步。这些变化和进步，既是学科自我发展、自我调整的反映，又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文化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大体说来，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1983年，是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的培育期。

“文革”结束后的几年，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拨乱反正的举措，明确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倡导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在此背景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引起重视。

1982年12月，上海召开“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集全国三十多个单位的著名专家、学者，共商如何开展文化史研究，以填补“巨大空白点”。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关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专题性学术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有学者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实际，以“把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到研究日程上来”为题，发表谈话，并再三强调，必须组织起来，通力合作，攻克难关^①。组织起来，把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无疑体现了学科建设的要求。1983年5月，长沙召开的全国历史学科“六五”规划会议，明确把中国文

^① 陈元晖：《把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到研究日程上来》，《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第39页。

化史、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纳入议事日程，并议定分别编辑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和“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这次会议初步确立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学科地位，并对全国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课程设置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文化史研究的实践看，这一阶段，学界历经十年“文化大革命”后，痛定思痛，主要是在反思中摸索前进。人们重提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文化的定义、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历史特点与地位等进行了讨论，但就总体而言，仍嫌宽泛。比如，学界对文化的解释，绝大多数论著都引用“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对文化的反作用、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文化视角的多样性等缺乏充分认识。有些文章在立意时虽主张不能仅从政治标准评判中国文化，但文中却仍旧以文化的阶级性、革命性为主要判断准则，阶级分析是运用最多的方法之一。从问题意识看，不少文章是为了“拨乱反正”，思维模式留有旧的印迹。具体的研究对象也与以前保持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洪秀全、孙中山、胡适、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等，是主要论题。整体而言，1983年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国文化史研究初兴，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融入其中，尚乏学科独立性。

第二阶段，从1983年到1989年，是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的快速成长期。

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走上自觉，学科发展迅速，成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化通史领域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当时，经济改革的深化，推动了全社会思想观念更新，“文化热”、“传统文化热”渐入高潮，学界围绕中国文化危机问题、传统文化的估价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简单地说，这些争论可归为一个问题，即中西古今问题。在此背景下，不可能避而不谈中国近代文化。

1984年，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与教学全面铺开。北京市史学会编《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专辑》、中华书局版“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先后付梓。与近代文化史有关的专论、专栏在各大报刊和重要学术刊物，纷纷出现。11月，“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和河南省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在郑州召开了首次全国性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就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意义、对象、范围，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作用、历史地位以及有关文化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积极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在全国的展开。同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这是全国高等院校成立的首家专门研究机构。北京师范大

学等高校还把中国近代文化史列为大学必修课程，并招收以近代文化为方向的研究生。

1986年1月，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在复旦大学举行，中国近代文化成为这次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所提交的学术论文中，近代文化史的论文占据相当大的比例。1987年，华中地区召开“中国走向近代化历程”学术讨论会。同年，“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和湖南省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在长沙召开第二次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这一系列会议的召开表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已越来越引起学界的重视。

就理论方法而言，这一时期，西方文化理论、现代化理论大量输入中国，活跃了学术气氛。不少学者主张不能仅从政治标准研究近代文化，还应当充分注意文化的特性。龚书铎的《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历史研究》1985年1期）、庞朴的《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5期）和《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等，结合文化的结构、性质来研究近代历史，拓宽了研究路径，实质性地推进了近代文化史研究。运用现代化理论来研究近代文化的论著更是多见。章开沅主编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收有《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多部与近代文化史相关的著作。针对海外学者的“冲击—反应”模式，有人发掘中国传统资源，重提以明清之际为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端，而不赞同以鸦片战争为起点^①。不少论者从近代化角度重新审视洋务运动，提出洋务思潮概念，肯定它对封建传统观念具有冲击作用，对学习西方有促进作用^②。备受争议的“西体中用”说也以现代化理论为基础，主张此说者认为，现代化就是“体”的变化，社会存在的本体和本体意识的现代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应是近代中国文化的合理道路^③。这些观点或有其不足，但对于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一阶段，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据统计，国内公开发表相关论文六百多篇，专著、论丛、文集有二十多种^④。一批高质量的学术专著相继

① 冯天瑜主编：《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巴蜀书社1988年版。

② 王劲、张克非：《洋务运动史第三次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③ 《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纪要》，《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④ 王燕军：《近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述评》，《华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

杀青或出版。如龚书铎著《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李侃著《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等,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的奠基性著作。研究范围空前广泛,几乎涉及近代文化的各个方面。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文学、艺术、史学、佛学、科技、教育等近代文化研究各领域,均有专史著作出版。论题已涵盖近代一百一十年,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化,都有较深入的研究。文化心理结构、文化启蒙、改造国民性、中外文化交流等,成为广受研究者关注的兴趣点。

诸多专题研究中,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研究成果突出。1840—1919年的政治思想史著作,有邵德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桑咸之与林翘翘合写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等十余部。1919—1949年的政治思想史著作,则有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严怀儒、高军、刘家宾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简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陈旭麓主编《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这些著作,尽管在具体论断、体例、表述等方面,存有些许差异,但在观察问题角度、材料取舍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则表现了共同的取向。他们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说法,认为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前与后,构成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四”以前,属于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重在揭示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产生与演变,即资产阶级两大派别改良派与革命派及其改良思想与革命思想的相互斗争的过程与规律;“五四”以后,属于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主要是研究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直至指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问题。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思想和革命思想,是上述著作的既定主题和主线。革命思想居于核心地位,阶级分析是主要研究手段。应当肯定,这些著作不乏原创性,有的还下过扎实的整理史料功夫。他们所揭示的历史脉络和总体趋向,时至今日,仍不失其价值。但缺点也较为明显,其中不少著作对革命阶级的思想缺乏严肃的反思精神,对非革命阶级政治思想的合理性因素认识不足。

较为系统的思想史著作出现于1988年。是年,李华兴、张锡勤的同名著作

《中国近代思想史》，分别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部著作，与同期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有很多相同处，但又有大的突破。其一，积极评价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性，强调学习西方的积极意义。张著认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是学习西方、输入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西学东渐史”^①。李著也认为，“向西方学习，成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大课题”^②。其二，思想史的内涵更为丰富，注重从文化角度论述问题。这两部著作力图突破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多方面展示思想史的内容。张著明显加大了文化思想史的比重，重视著名人物哲学思想的研究，并涉及史学思想、文学思想、道德思想等。李著从文化角度考察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思想进程，解剖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惰性，认为“对传统文化的保留态度与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态度，就成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不小的一个特色”^③。他们在分析问题时，关注到民族素质、国民性、文化心理结构，以及文化因素与思想变化的关系等内容，表现了不同于政治思想史的特质。其三，学术观点与时俱进，努力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与此前的一些著作相比，这两部著作对洋务思想、改良思想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张著把洋务思潮作为近代中国“寻路”的六大思潮之一，李著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维新思想为先进思潮。这些都体现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在不断寻求突破。

总体看来，由于这一时期的文化史研究寄托了太多的现实诉求和理想抱负，人们过于关心中国文化的当代价值，导致思想史选题偏多，有的论著激情胜过学理，稍显空疏。

第三阶段，从1989年到1999年，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大为深化、全面。

进入90年代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大潮拉近了文化与经济的距离，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出现“国学热”、“儒学热”、“学术中立”等说法。有人称之为第二次“文化热”。也有人以“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来表述学术思想界的变化。而中外学术交流的增多，特别是海外汉学成果的大规模引入，进一步开阔了国内学者的视野。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趋向。

在整体方向上，90年代的近代文化史研究有这样几个大的变化。

① 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② 李华兴：《中国近代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③ 李华兴：《中国近代思想史》，第16页。

首先是史学研究取向、评判标准有所调整。确如有学者所说：“大致以1989年为分水岭，呈现出两种趋势。前一个阶段否定传统、呼唤西化比较多。后一个阶段肯定传统、再造传统比较多。”^①不少学者对西方学者提出的“冲击—反应”等说法提出质疑，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认同的成分增多。与此相应，研究重心发生转移，与近代民族主义或保守主义相关的思潮、学派、人物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兴趣。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现代新儒学研究。仅方克立、李锦全就合作主编有《现代新儒家学案》（三卷）、“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十五本）、“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近二十种）等，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还有些学者，甚至采取保守主义者的立场，认为近代以来的文化运动是由激进主义主导的，并予以否定。

其次是学术宗尚的变化。与8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学风趋于踏实，实证性研究增多，选题趋于专门、细化，学术史受到一些研究者的喜爱。关于近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或文化大师，都有几种甚至十几种研究专著，一些过去不受重视的人物也有专门性论著发表。

再者，在理论方法上，注重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其中，社会史对近代文化史研究影响明显。在推进上层精英人物思想研究的同时，社会中下层的思想文化受到重视，社会思潮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出现高潮。这一方面，葛兆光所著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把“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作为思想史的重点考察对象，在写法上有其特色。他认为，过去的思想史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而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在真正地起着作用。一些学者还把社会思潮史与文化史结合起来，提出文化思潮史的概念。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从思潮与学派的关系切入，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也不限于精英人物的思想文化研究，而在文化史、社会史、学术史之间寻找契合点。

在具体学术领域，90年代的近代文化史学科明显呈现出发展壮大的态势，研

^① 肖海鹰：《庞朴的新文化论语》，《深圳商报》1994年4月24日。

究专门、深入。

一是思潮史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进入 90 年代后,以“社会思潮”命名的著作明显增多,诸如吴雁南等主编《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冯契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起出版)、胡维革《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 1994 年版)、戚其章《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黎仁凯《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等。这些著作在撰述方式、框架结构、具体观点等方面不乏特色,但在理论方法上则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史和现代化理论方法的影响。这里重点分析《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吴雁南等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和《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彭明、程歆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两书。两书篇幅相差较大,但主要观点和理论方法则表现出不少共性。在内容选择上,两书均取 1840—1949 年的社会思潮为研究对象,力图全面系统地展示近代中国百年思潮的发展演变,把握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主流和方向。在理论方法上,两书明显受社会史的影响,重视社会心理意识研究。前者强调,社会思潮同社会史联系密切,“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思潮,既具有理论形态,又具有心理形态,是理论形态和心理形态的统一”^①。后者认为,中国近代思潮,是指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那些特定的阶级、阶层、集团的社会心理、人文观点及其理论意识形态的总和。吸纳社会史研究方法,把研究主轴从人物分析转向群体意识分析,是作者努力追求的目标之一^②。在治史理念上,都尝试在 80 年代思想史研究基础上,积极吸收现代化理论成果。前者明确宣布,把“是否有利于民主化,是否有利于中国近代化进程,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作为评价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重要标尺之一^③。后者则把中国近代思潮的主题归结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的现代化,并把社会思潮与人的现代化结合在一起,提出:“一部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本质上是中国人自我发现、自我觉醒和自我选择民族生活方式的认识史。”可以看出,两书力争摆脱过去简单化、教条化处理问题的方式,综合考虑中国近代思潮的外部 and 内部诸多复杂因素,运用多种理论方法,较客观地反映中国近代思潮的历史进程。

① 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 页。

② 彭明、程歆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 页。

③ 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 5 页。

二是学术史研究进入主流。学术史研究的重新兴起，特别是对近代学术史加以专门研究，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有人认为这与“文化热”有关，是多年“文化热”后的反思而促成之。也有人认为这与世纪末的境遇有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既往特别是20世纪的学术予以回顾与总结，是学术逻辑演化的必然。这些说法有其合理处，但还要看到，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深化和中国学者的自觉。一方面，近代文化史上，诸如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郭沫若等关键性人物，都称得上学贯中西，随着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对他们的学术思想加以系统清理和认真总结。另一方面，为摆脱依附于西学话语的尴尬，中国学者迫切需要建立一套适合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话语系统，这也为具有本土色彩的“学术史”兴起提供了可能。这方面的成果，有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杨向奎主编的《清儒学案新编》（齐鲁书社1985—1994年，其中不少是晚清人物）等。在学人研究方面，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国学大师”丛书，收录“近现代有学问的大宗师”达三十位之多。总序《重写诸子春秋》明确表示，该丛书以学术为立传标准，所谓“国学”，特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之后的中国学术。尽管此前也有专书对其中的一些人物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但如此集中地进行考察，尤其是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群体进行系统研究，则是首次。河北教育出版社则推出由刘梦溪主编的大型丛书“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专门整理和收录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胡适、张君勱等众多著名学者的学术文集。

三是社会文化史兴起。受社会史影响，一些学者开始重视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研究。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室和《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共同发起召开“社会文化史研讨会”，就社会文化史的基本内涵、研究对象与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研究者认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也可以有广狭之分。广义来说，可以视为是一个学科领域的划分，即凡属社会、文化交织领域如风俗习尚、教育、宗教、文化传播、生活方式、大众文化、民众观念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属此范围。狭义来说，强调其社会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即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观念的联系，及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互动关系。与此对应，社会文化史也有广、狭两义。广义而言，主要指其研究范围，即社会文化史是研究以往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文化交织现象的历史。狭义而言，主要指其研究视角或研究方法，即社会文化史是研究以往社会发

展过程中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的相互关系的历史，是用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或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的历史研究视角^①。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刘志琴主编、李长莉等执笔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该书以大量报刊、笔记等资料为基础，运用编年方式，对 1840—1921 年八十年间的世态民情、风俗习尚、社会热点、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的演变，进行了史料整理和简要评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拓宽了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方向，展示了文化史与社会史等相关学科结合的发展潜力。

学科建设也有所进展。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 1997 年版）为历史专业的学生学习近代文化史提供了范本，被教育部指定为研究生教学用书。以中国近代文化史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相继毕业，专业队伍得到壮大，形成较为合理的学术梯队。不过，与各具体领域的成果相比，这一时期的学科建设远远滞后。十年中，不仅没有召开全国性的学科规划会议，而且连全国性的近代文化学术会议也付之阙如。学界富有影响力的“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也在这一时期停止出版。

第四阶段，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呈现出百花争妍的景象。

新世纪新风貌，进入 21 世纪后，学科组织建设明显增强。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国近代文化史专业队伍得到快速发展。。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已成为骨干力量。老一辈学者仍然健在，而经过专业训练的博士毕业生每年达数十名，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学术队伍当中，增添了生机与活力。就专业人才的数量和学历而言，都是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不可比拟的。

学科规划、学术交流受到重视，学术团队建设得到加强。2004 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并邀请在京近代文化史专家学者五十余人，举行“中国近代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学术座谈会，积极谋划今后文化史学科的发展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联合有关单位，发起成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先后召开“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传统思想的近代转换”等系列学术会议，推动思想文化史研究。2007 年夏，北京师范大学组织召开“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全国重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70 余人参加会

①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4 期。

议。这次会议是继 1987 年郑州会议后召开的又一次全国性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会议，反映了学界最新研究水平。为方便学术交流，北京师范大学还创办了学术专刊《近代文化研究》和学术网站“中国近代文化网”。

21 世纪的文化史研究表现出多元发展取向和强烈的求新意识。研究方向不一而足，学术史、思想史、观念史、知识史、社会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异彩纷呈。学术史方面，龚书铎主编的三卷本《清代理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首次就清代二百六十余年间的理学做专门系统研究，被认为是这一领域的标志性成果。桑兵主编的“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对政治学、社会学等近代新学科的知识脉络作了认真分梳。张岂之主编的《民国学案》（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以三百七十万字的篇幅就民国著名学者的学术成就及论著予以整理。思想史方面，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借鉴海内外理论方法，就中国现代性话语系统予以反思；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等，切实推进了 20 世纪前期的思想观念史研究。

在理论方法上，一些学者借鉴海外的新文化史、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理论方法，更新治史理念，丰富研究手段。欧美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林·亨特等人的著作受到不少年轻学者青睐。陈恒、耿相新主编的《新史学》（大象出版社 2005 年版）出版“新文化史”特辑，专门介绍新文化史的学术前沿。文化与社会互动研究，中下层文化史研究，已引起文化史研究者的普遍重视。耿云志主编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把鸦片战争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基本的考察时段，强调文化转型与社会变迁的关联，关注外来文化的刺激与影响。相较于中国文论界、哲学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史学界影响稍迟，此期也受到一帮年轻学者的热议。知识考古、文化霸权理论、文化建构论、话语分析方法等后现代主义的治史理念和方法，启发人们重新思考中国近代文化史诸问题。

新的世纪，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方兴未艾，充满了希望。

二

新时期三十年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其间形成不少争论，如关于中国近代文化的起源问题、关于洋务思潮的评价问题、关于中体西用的评价问题、改良思

想与改良主义的关系问题、救亡与启蒙的关系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问题、现代新儒学评价问题、自由主义的评价问题、民族主义的评价问题等。这里仅择取三个较具代表性的问题为例，予以阐述。

1. 学科理论诸问题

新时期三十年，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由微而著，学科理论建设在其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任务、分期、方法、历史地位，关于近代文化的性质、特点、结构变化、发展规律以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近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学界都做了有益探讨。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绝大多数学者赞同采取文化的狭义，但具体理解有所不同。李文海主张把文化现象分为三类：观念形态；传播和反映这些观念形态的媒介和方式；群众日常活动中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生活要素。据此，他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这三个方面的状况^①。刘志琴也取文化的狭义，主张把意识形态作为文化史的研究对象^②。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则以观念形态的文化，也就是与政治、经济相应的文化为研究对象。关于近代文化史的研究任务，有人主张，文化史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文化的精华部分，或者说是进步文化的方面。李文海认为，精华与糟粕、进步文化与反动文化，相互缠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其社会影响而言，是比那些进步的或革新的新文化更加经常起作用的社会存在。因此，应纳入重点考察对象^③。

近年来，欧美新文化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引起一些学者对这些问题重加思考。郑大华强调，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

① 李文海：《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与任务刍议》，《中国近代文化问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页。

② 刘志琴：《怎样认识文化史》，《中国近代文化问题》，第36页。

③ 李文海：《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与任务刍议》，《中国近代文化问题》，第8页。

的研究,尤其是要关注“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有学者指出,在确立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时,有必要考虑这样几个方面问题:一是要区分近代文化与近代历史上的文化,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结合;三是既要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①。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开端,多主 1840 年鸦片战争说。此说立论的根据主要分两种情况,一是遵从社会性质、社会形态的划分标准,认为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凡反映这一社会观念形态的文化即近代文化;一是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认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最大动力源自外部,始于鸦片战争。尽管双方观点有很大出入,但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起始时间则少有争议。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各种现代化理论流入中国,受此影响,有学者试图重新论证中国近代文化的起源问题。针对韦伯、费正清等人把中国现代化归于外力推动的结果,萧蓬父、冯天瑜等重提侯外庐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说。不过,与侯外庐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立论不同,萧、冯主要是从文化现代化的角度予以解说。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从民族文化传统中寻找内在的历史根芽,从 17 世纪以来中国曲折发展的启蒙思潮中去探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明清之际出现的具有“破决启蒙”性质的社会思潮可视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起点^②。萧、冯的论点遭到包遵信、陈卫平等人的质疑。陈卫平认为,明清之际思想是近代思想的胚胎,所谓胚胎,就是说明清之际表现出从传统过渡到近代的某些动向,但它与西方文艺复兴不相类。彭明、程献主编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也对近代思想文化的起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探索近代思想文化的起源,既要充分把握中国外部条件的变化,更要充分考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迁和文化积累。因此,论析近代思想的起源,就需要跨过作为政治史开端的 1840 年,对乾嘉以来的社会事件有所考察^③。最近,耿云志在其新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中指

① 《笔谈：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反思》，《史学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

② 1983 年萧蓬父在《中国社会科学》第 1 期发表《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1984 年冯天瑜和周积明在《中国史研究》发表《试论中国和欧洲早期启蒙文化的异同》，1985 年冯天瑜在《历史研究》发表《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到近代新学》；冯天瑜主编《东方黎明——中国近代文化走向近代的历程》，巴蜀书社 1987 年版。

③ 彭明、程献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第 5 页。

出，片面强调外来文化的冲击作用，或片面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传统文化内部新质因素的积累与外部的刺激主次地位的变化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①。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结构问题。龚书铎《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历史研究》1985年1期）纵横结合，就近代文化的结构与发展予以阐述。该文指出：近代中国文化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文化构成上，由鸦片战争前单一的封建文化，变为包括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资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在内的复合体；在内部结构上，以儒学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文化，逐步让位于以民权、平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在部门结构上，原有学科如史学、文学等在学科内容、体系等方面发生变革，新学科如政治学、法学、自然科学等逐渐兴起。庞朴的《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5期）把文化视为立体的系统，分为物质层、心物结合层（即理论、制度层）和心理的层面。他认为，从鸦片战争，中经甲午战败，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整个中国近代文化史，表现为文化三结构的依次展开。王先明则把文化模式理解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结构，也就是一定的文化在特定历史阶段演进过程中的文化结构形式。他认为，“中体西用”并不只是一种洋务派的思想原则或纲领，或社会思潮，还是近代中国独有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突破了传统的体用同源或体用不二结构模式，也不同于西学的文化模式，在近代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独特作用^②。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研究者虽无大的分歧，但在具体表述上存有差异。龚书铎把近代文化的特点归结为四：第一，近代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冲突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第二，民主与科学是近代文化的核心；第三，近代文化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在一起；第四，近代文化既丰富多样，又肤浅精糙，没有完整的体系^③。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可用“中、外、古、今”来概括。中、外、古、今文化互相斗争，互相渗透、融合，构成了近代文化多样复杂的特点。还有学者对近代文化的缺点予以总结，认为近代文化与政治结合得过于紧密，过分从属于甚至完全屈从

① 耿云志：《近代中国转型研究导论》前言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 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第七章，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③ 龚书铎：《略谈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于政治，缺乏一定独立性，相对忽略了全民族文化科学素质的提高^①。

关于近代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流行的看法是，中国古代文化成就辉煌，近代文化贫乏落后；近三十年来，这种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学者认为，应该历史地看问题，从总体发展趋向上看，近代文化有相当大的进步。它有了资本主义文化，后来又有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这与古代文化相比，显然是质的变化。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百家争鸣、文化大发展时期，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还有学者以中西文化的大融合来标示近代文化的进步。史全生《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年版）指出，民国文化在民主自由思想、自然科学和人们的科学精神、民族精神三方面均有长足进展。

2. 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的关系问题

诸多问题中，围绕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的关系，学界争论较多，关涉面较大，富有代表性。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之争，其间有分有合，鉴于二者割不断的联系，在此一并叙说。

新时期对这一历史问题的探讨与对“文革”的反思密不可分。鉴于此前对革命思想的颂扬、对改良的贬抑，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一书以太平天国革命、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和革命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为对象，作了有针对性的解析。他认为，此前在歌颂农民战争的旗号下，把太平天国和洪秀全说得十全十美，歪曲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在反地主统治的革命中，小农的封建性及其沉重的社会影响不可低估；改良派的自由主义思想具有抵抗侵略的爱国主义和反对封建落后的特征，在历史上起了深刻巨大的启蒙作用；革命派由爱国而革命，是为了国家的独立、自由、富强而革命，从思想史角度看有其不足，思想启蒙工作，革命派做得很少，也不重视。1980 年，陈旭麓发表《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收入《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一文，予改良和改良主义以新的评价。他指出，改良决不是历史的赘疣，不能简单视作是灰色的、骑墙的和反动的，视作阻止和对抗革命的政治势力；它与革命相辅而行，对立统一，不能互相替代、互相抹杀。学界对革命与改良重新定位，意味着与此密切相关的太平天国革命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资产阶级革命

① 李侃：《中国近代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 年版。